二十大报告读解: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编者按: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始终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愿同世界携手开创人类更美好的未来。为了更加深刻地学习和领会党的二十大精神,本刊邀请一批专家,分别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等角度进行解读,以飨读者。

在落实“两个倡议”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王公龙[①]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始终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宗旨,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落实”。[②] 这是我们党首次将“两个倡议”写入党的政治报告,并明确提出通过落实“两个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两个倡议”的提出不仅丰富发展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而且充分展现出中国共产党在世界大变局背景下推动建设美好世界、为世界作新的更大贡献的历史主动精神和强大政治意志。

---

① 王公龙,中共上海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执行院长、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副秘书长、二级教授。

②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22/1026/c1024-32551597.html。

一、“两个倡议”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主张

“两个倡议”是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主张,其目标指向就是要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中国之所以提出“两个倡议”,是因为当今世界的和平、发展问题日益突出,人类面临的风险和挑战日趋严峻。

在和平方面,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特征更加明显,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由于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此消彼长的变化,超级大国为了维持其霸权地位,在国际政治中搞拉帮结派,构建各种有明确针对性的政治和军事合作机制以应对其他大国的崛起,导致大国间战略互信基础被严重削弱,国际社会普遍担心世界滑入新一轮的冷战之中。尤其是 2022 年 2 月俄乌冲突以来,俄罗斯与西方世界的矛盾急剧激化,世界大国间爆发直接冲突的危险明显升高。如何阻止全球安全形势的持续恶化,为世界和平与稳定创造条件,已经成为摆在全人类面前的突出和紧迫问题。

在发展方面,全球发展进程正在遭受严重冲击。长期以来,南北发展不平衡问题始终是世界经济发展中的难题。尤其是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随着“逆全球化”思潮的抬头,南北差距、复苏分化、发展断层、技术鸿沟等问题更加突出。近年来,在世界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相互交织下,各种安全挑战层出不穷,世界经济复苏步履维艰,超级大国又在推动所谓经济、技术脱钩,导致全球发展遭遇严重挫折。国际社会迫切需要一个有影响力、号召力的全球性发展方案,以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方面作出更多制度性安排,促进区域经济进一步开放、交流、融合,为世界经济发展指明出路。

总之,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取决于各国人民的选择”。国际社会迫切期待负责任大国在世界和平与发展问题上提出先进思想。中国提出“两个倡议”就是为了给“站在十字路口”的世界指明前进的方向。

二、“两个倡议”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方案

“两个倡议”是着眼于解决当下国际社会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而提出的中国方案,体现“治标”与“治本”相结合,为世界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安全提供了系统的思路,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方案。

第一,以构建美好世界为根本目标。“两个倡议”的根本目标就是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安全与和平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安全是和平的基础。实现世界的持久和平,需要可行的安全方案。全球安全倡议是解决世界和平赤字的方案。与西方传统安全观不同的是,全球安全倡议倡导“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共同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全”,这是解决世界和平与安全的根本之道。全球发展倡议提出的“6个坚持”,就是一套系统解决当下世界发展赤字的现实可行的方案,包括把发展放在优先位置;发展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要坚持普惠包容;把创新驱动作为发展的动力;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发展要坚持行动导向。

第二,以促进全人类共同利益为基本考量。“两个倡议”从全人类共同利益出发,力图通过扩大合作增进共同利益,构建利益共同体,实现互利共赢,“共同推动全球发展迈向平衡协调包容新阶段”。[①] 为此,“两个倡议”在四个层面提出具体主张。在全球层面,全球发展倡议主张将发展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加强主要经济体政策协调,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构建更加平等均衡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推动多边合作进程协同增效,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②]“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③] 在国家层面,全球发展倡议主张坚持普惠包容,“关注发展中国家特殊需求,通过缓债、发展援助等方式支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468页。
② 同上。
③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469页。

持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困难特别大的脆弱国家，着力解决国家间和各国内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①]在个体层面，全球发展倡议倡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在人与自然关系层面，倡导“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②]

第三，以解决国际社会难题为现实指向。“两个倡议”的思路既是破解国际社会现实难题的思路，也是克服西方霸权治理弊端的思路。面对世界南北国家发展差距的扩大，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实践方案，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新的发展机遇，推动世界共同发展、平衡发展。在“逆全球化”思潮抬头的背景下，中国致力于引领经济全球化发展，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中国坚持经济全球化正确方向，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进双边、区域和多边合作，促进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共同营造有利于发展的国际环境，共同培育全球发展新动能，反对保护主义，反对‘筑墙设垒’、‘脱钩断链’，反对单边制裁、极限施压。”面对全球治理遭遇的困境，中国呼吁各方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面对“文明冲突论”“种族优越论”等错误论调，中国倡导树立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面对霸权国家打着“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旗号，在国际上推行单边主义、霸权主义，中国提出“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反对一切形式的单边主义，反对搞针对特定国家的阵营化和排他性小圈子。”

三、在落实“两个倡议”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两个倡议”致力于推动建设美好世界，反映了世界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的向往和追求。但要充分发挥“两个倡议”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积极作用，还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外文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469 页。

② 同上。

必须推动国际社会对“两个倡议”的广泛认同,促使“两个倡议”的理念真正落到实处。

第一,大力倡导“两个倡议”,争取广泛国际认同。“两个倡议”提出以来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并产生了日益广泛的国际影响。但必须看到,这是社会主义中国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背景下提出的主张,在国际力量对比出现深刻调整,国际政治博弈和大国竞争不断加剧的背景下,美西方国家往往会对中国倡导“两个倡议”的动机持高度警觉和强力抵制的态度。通过大力倡导“两个倡议”,以问题为导向、以“就事论事”的方式积极回应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发展和安全议题,不仅容易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理解和支持,而且也有助于避开不必要的争议,降低西方国家的疑虑心态和非理性反弹,推动“两个倡议”获得广泛的国际共识,在解决具体问题中产生润物细无声的国际传播效果。

第二,维护“两个倡议”,努力建构国际准则。国际准则对国际关系行为体具有规范和约束的作用。由于“两个倡议”是以促进全球发展和安全为方向,以促进全人类整体利益为着眼点,其基本思路就是摆脱西方传统的安全观念、发展观念和治理观念。因此,要扩展“两个倡议”的国际认同度,不仅要旗帜鲜明地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最大限度争取国际社会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对“两个倡议”的理解和支持,凝聚起维护“两个倡议”的国际联合力量,而且要创造条件、抓住机会,推动“两个倡议”制度化建设,努力将其转化为国际社会处理重大问题的基本准则,以充分发挥制度的权威性、规范性和约束性功能。

第三,践行“两个倡议”,提升中国的引领能力。中国是“两个倡议”的首倡者,也是最有力的推动者。为了进一步促进国际社会更加主动地接受“两个倡议”,自觉地践行“两个倡议”,中国还需要不断提升国际引领力,包括舆论的塑造、理念的传播、议题的设置、规则的构建、事务的主导、组织的领导等方面的能力。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特征更加明显,对中国推动国际社会践行“两个倡议”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为此,中国应本着主动引领、积极作为的姿态,努力引导更多国家和地区与中国一道积极践行“两个倡议”,在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国际秩序有序运转、推动和完善

全球治理、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促进地区安全形势缓和、维护全球生态环境等一个个重要国际议题上提出具体主张，将“两个倡议”转化为国际性公共政策产品，让更多的国家从中获益，切实感受到中国方案的影响力、亲和力和生命力。

总之，“两个倡议”聚焦于全人类的前途和命运，以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为目标指向，牢牢占据着理论制高点、道义制高点、价值制高点，为引领时代潮流提供了行动指南，为动荡变革的世界廓清了迷雾，为全球和平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但必须清醒地看到，落实“两个倡议”是合作与斗争并存的历史过程，不可避免会遭到各种阻挠和干扰。中国唯有保持强大战略定力，坚信“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理直气壮地举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坚定推动“两个倡议”的落实，才能不断地汇聚起推动世界发展的“正能量”，汇聚起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磅礴力量，为世界和平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推动外部环境整体向好发展

李开盛[①]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相对十九大报告来说，各种风险与挑战被摆到一个更加突出的位置。正如报告在第十四部分所指出的那样，“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霸权霸道霸凌行径危害深重”，“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这种描述的变化，一方面反映出世界局势确实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中国共产党直面挑战的勇气与担当。从学者的角度看，就是要结合近几年世界地缘政治与经济的深层次变化，深入把握三“变”三“霸”和四个“赤字”等集中挑战背后的深层根源、内在逻辑与未来走向，对“世界怎么了、中国怎么办”这一历史之问做出前瞻性解答。

① 李开盛，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一、当前挑战如此集中的原因

近年来,各类传统与非传统挑战相互叠加,地缘政治与经济矛盾全面互渗,大国间对抗前所未有地加剧,亚太地区局势未稳又遇上欧洲俄乌冲突,挑战的严峻与集中程度确实是多年来所未见。之所以如此,除了具体的触发因素以外,从更深层次看,是基于如下原因:

第一,世界发展失衡。由于历史形成的国际政治经济不平等结构,西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一直处于不平等的全球分工体系状态,后发国家能够通过自己努力而实现赶超的终究只是少数。通过垄断核心技术、掌握金融霸权以及滥用国际性组织权力以及自身优势,发达国家继续保持了相对于发展中国家的领先优势。新冠疫情的冲击,进一步把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在经济体系、社会设施、医疗条件等方面的脆弱性暴露无遗。在急需推动经济复苏的后疫情时代,发达国家也可以通过掌握更多的经济工具而较快实现恢复性增长。这种深层次的发展失衡将驱使那些邻近发达国家的拉美、北非、中东国家的民众“用脚投票”,通过移民问题加剧发达国家内部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危机,从而助长西方民粹主义上升。通过西方国家内部的选举机制和这些国家的强大影响力,这种民粹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又转化为外交政策,从而对世界局势造成深刻影响。

第二,多极化潮流受阻。在缺乏一个集中有效权威治理的国际无政府状态下,适当的大国平衡,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多极化,是实现世界安全、和平与发展的必要条件。这是因为,只有一定程度的多极化,才能充分代表不同地域和历史文化背景下国家的利益,并通过一定的协调与平衡机制,约束霸权国家为所欲为,在实现一种动态和平的基础上最大可能地实现世界的均衡发展。但是,近年来的客观情况是,中美两国国力发展已远远把其他国家抛在身后,欧盟作为一支整体力量由于英国脱欧以及新老欧洲矛盾等因素而力量趋弱,俄罗斯一直未能有效调整经济发展结构和实现其经济发展动能转换。在主观层面,美国一直不愿意接受多极化这一前景,垄断霸权心态反而更加强烈,并通过强化盟伴体系尤其

是拉拢西方伙伴,对中、俄等进行打压,试图把多极化趋势人为地转变为两极对抗格局。原来可以通过多极化解决的问题,被两极对抗所挟持、甚至放大。

第三,全球治理薄弱。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国际上的事由大家共同商量着办”,[①]但是协商的平台近年来不是进一步加强而是被削弱。这首先体现为重要的全球性治理平台疲软无力的状态没有根本改观,联合国的改革一直难以找到有效的突破口,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投票权虽有所提高,但美国仍然拥有否决权而一枝独大。在其他重要的国际治理平台方面,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把俄罗斯踢出了八国体系,重新恢复七国集团建制。在 2008 年应对金融危机的紧迫需要过了之后,西方对二十国集团的重视程度实际上也在下降。在全球安全治理方面,美国继续加大对军事同盟体系的依赖,北约甚至有向亚太扩张之势,从而导致更多地区局势不稳。在全球经济治理方面,美国出于霸权护持需要,打造以自己为中心的产业链和供应链,推行与中国经济脱钩,使全球化进程遇到重大挫折。在非传统挑战应对方面,各国在处理气候变化、新冠疫情、能源危机等方面,基本上是各自为政,没有形成统一有效的国际治理平台。

二、我们对未来外部环境有充分信心

从前述分析可以看出,尽管当前世界之变有着客观的历史与现实背景以及相关国家因素,美国在其中的挑动、破坏性作用不容忽视。特别是在推卸自身全球治理责任、制造大国对抗方面,美国利用其自身的霸权地位,起到了非常消极的作用。但如果放在更长时段来看,我们对未来外部环境还是应该有充分的信心。这是因为,拜登政府当前几方面的做法有着先天的局限:

第一,以意识形态牌蛊惑人心,但难以长久奏效。拜登政府试图通过给中国政治制度贴上各种负面标签,把世界人为地分裂为所谓“专制”与“自由”阵营,为

① 《习近平谈多边主义要义:国际上的事由大家共同商量着办,世界前途命运由各国共同掌握》,http://www.gov.cn/xinwen/2021-01/25/content_5582457.htm。

此召开所谓的民主峰会,在各种场合大谈价值观外交等,并把台湾议题、俄乌冲突等涉中、俄议题价值观化。这一做法显然是在扭曲事实。当前中国不是冷战时的苏联,中国始终主张各国根据本国国情走自己的道路,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倡导不同制度共存与文明互鉴,无意与美国进行意识形态抗争。美国之所以时刻心念价值观斗争,一是以此捍卫自己霸权的需要,二是受自身价值观输出逻辑的影响,以为中国迟早也会与美国一样。但中国不在国际上搞意识形态斗争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因此美国的价值观外交调子唱久了,势必会发现别人不信、中国不跟,特别是那些广大发展中国家,更不会把美国的意识形态说辞当回事。

第二,经济脱钩有一时之功效,但难以逆转市场。美国想在经济上与中国搞脱钩,试图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卸动力、踩刹车,但事实上已不可能。当前中国已是世界大多数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中美贸易在2021年达7556.45亿美元,[①]虽然中国有着较大的贸易顺差,但主要是向美国出口其本身因为产业转移而较少生产的电器机械设备以及各类生活用品等,事实上为美国聚焦高端生产与服务提供了支持,是在全球化趋势与市场分工基础上形成的双赢格局。拜登政府出于政治目的,试图推进产业向美国回流,在芯片等关键行业建立排除中国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可能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得逞,但除了遭遇战争这样的极重大事变外,中美两国的自然要素禀赋以及长期形成的市场分工是不能由于政治因素而全部改变的。而且,中国还与其他国家有着广袤、深厚的经济联系,即使是美国的西方盟友,如德国、韩国等,一方面不得不对美国的政策有所呼应,另一方面也明确表示不能与中国脱钩。只要中国铆紧了全球化进程不放松,中国就仍然是世界上重要的经济力量,不可能被外在力量所孤立。

第三,盟伴体系有围攻效果,但利益基础成疑。拜登政府在打造盟伴体系方面非常积极,视此为围攻中国的主要手段,除了强化传统同盟关系外,先后推出或提出美英澳伙伴关系、印太经济新框架、芯片联盟、蓝色太平洋伙伴关系等。但盟伴关系要真正起效果,必须面临共同威胁,或是以共同利益为基础。在美国

① 中国外交部:《中国同美国的关系》, https://www.mfa.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bmz_679954/1206_680528/sbgx_680532/。

的大肆渲染下,可能那些盎格鲁 - 撒克逊小圈子国家还会在“中国威胁”上达成一致,但广大的亚太国家不会这样认为。即使是那些与中国有领土争端的国家,也从来没有认为会面临中国入侵的威胁。至于利益基础,更是与特朗普同样强调美国利益第一的拜登政府的软肋。就以韩国为例,拜登对其极力拉拢,在尹锡悦上台后主动首访韩国,尹锡悦政府也以推动建立韩美“全面同盟”相呼应。但即使如此,美国在推出的“通胀削减法案”中直接打压韩国汽车产业利益,对韩国政府的协商请求冷淡回应。在这种情况上,所谓的盟伴能跟美国一起走多久、走多远,其效果令人生疑。

三、积极推动外部环境向好演变

综合上述分析来看,要推动未来的国际环境朝着有利于我国和平发展的方向积极演变并不容易。这是因为相关挑战不但严峻,而且还在继续演进之中。2022 年 10 月拜登政府发布了延迟已久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在俄乌冲突持续进行的情况下仍然视中国为唯一可能改变国际体系的竞争对手,充分表明美国打压中国的决心长期内不会改变,各类打压的动作未来还会持续出台。另外,在全球化进程受阻、新冠疫情挑战持续的背景下,我国的整体外部生存与发展环境也较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世界各类地缘政治与经济矛盾日益聚焦到我们身上来,这已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事实。最后,我国在与外部关系中,仍然存在可能造成重大波折的难题,如台湾问题虽为我国内政,但处理不好可能会成为影响我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以及部分周边国家关系的重大冲击变量,涉华领土争端的处理也将长期困扰我国与部分周边国家的关系,一旦恶化就可能影响外溢。

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世界大势基本稳定,这为我们推动国际环境向好演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一是追求和平、防止战争,特别是防止核战争仍然是多数国家的共识,阻止战争的动能仍然强大。虽然俄乌冲突极大地改变了欧洲地缘政治面貌,但这一事件本身也进一步反映出战争所带来的巨大成本及其引发的不确定性,有利于其他国家更加明确追求和平的决心。二是全球化进程难以从根

本上逆转,大国竞争归根到底是利益政治,只有全球化才能为世界各国创造更大利益,同时通过合作应对气候变化、能源危机等共同问题。民粹主义干扰的杂音将长期存在,但它只能构成对全球化的某种纠偏,而不是彻底否定。三是对中美关系而言,尽管从特朗普政府到拜登政府都明确了对华打压战略,但两者在避免与中国发生武装冲突方面也有高度一致,两国间的利益基础、地缘缓冲空间仍为超越“修昔底德陷阱”提供了可能。

基于此,中国有必要充分发挥自身发展动能,积极利用各项国际有利条件,妥善克服和处理涉我重大矛盾,推动外部环境整体向好发展,特别是可在以下方面重点施力:一是通过协调大国关系,强化驱使外部环境向好的动力。特别是要坚决抵制美国以竞争界定中美关系的做法,倡导负责任的大国合作观,尽可能拨正并稳定中美关系,并在这个过程中争得政治上、外交上的主动权,为世界提供更多的确定性与稳定性。同时,要推动中欧关系尽快回稳,支持俄罗斯作为世界稳定力量发挥作用,妥善处理好对印关系。二是充分利用和发展好各类国际平台,为稳定外部环境提供制度化支持。在联合国暂难实现重大改革的情况下,强化大国间在这一平台上的沟通。充分发挥二十国集团等涵盖全球主要政治与经济力量的平台的价值,推动其在协调大国矛盾、解决全球性公共问题上发挥引领和示范作用。三是积极推动与周边国家的相关矛盾化解,如加大力度推进南海各方行为准则磋商进程,深化各种多边或双边的共同利益安排,通过地区合作构筑避免世界重大地缘政治与经济冲击的有力“堤坝”。

形势、角色、观念: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变革

张　骥[①]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新时代十年,“中国共产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

① 张骥,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教授。

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不仅具有重大的国内政治意义,也对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与世界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这一根本性的变革体现在我们党对世界发展的历史主动性的把握,体现在我们党对中国国际角色转变的认识和实践,体现在我们党引领中国人世界观念的觉醒重塑。

一、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把握世界发展的历史主动性

在党的历史上,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是制定内外政策的重要基础。二十大报告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判断是近年来我们党对国际形势和世界发展趋势的认识、把握、判断的总结和概括。“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重大论断的提出,阐明了当今世界的发展大势和中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揭示了国际体系转型过渡期与我国发展历史交汇期相互交织的阶段性特征。近年来,国际政治的突变和国际格局深刻复杂调整的进一步加剧,佐证了这一重大战略判断的科学性和前瞻性。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发展了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认识,指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同时,世纪疫情影响深远,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来自外部的打压遏制随时可能升级”“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二十大报告作出了“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的两个重要判断。[①]

十年来,基于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判断和把握,使得我们能够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国际格局急剧变化的局势中,掌握世界发展的历史主动权,及

①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22/1026/c1024-32551597.html。

时调整内外政策。新发展理念、统筹发展与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观等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提出,离不开对世界发展大势的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国际关系、“一带一路”倡议、全人类共同价值、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等一系列重大外交理念、思想、战略、倡议的提出,离不开对世界发展大势的把握。

十年来,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了人类文明的新形态,对世界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中国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成为变乱交织的世界中最重要的稳定性力量,全球发展赤字中经济快速、高质量发展的发展性力量;中国实现了超大规模国家的和平崛起,坚持走开放合作、和平发展的道路,成为地缘博弈、变乱动荡世界中的和平性力量,民粹迭起、逆全球化浪潮中的开放性力量。中国不仅在世界变局中牢牢把握住了自身发展的历史主动权,而且成为推动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最重要的积极因素,成为国际形势和世界走向的塑造者。这一变革意味着,中国从国际形势和世界大势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国际形势和世界大势的主动塑造者。

没有这种对世界发展的历史主动权的把握,我们就难以经受住来自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自然界等方面的巨大风险挑战的考验。从国际上来讲,对世界发展的历史主动权的把握,使得我们能够经受住了中美战略竞争、全球性世纪大疫情、乌克兰危机等重大风险挑战的考验。

与此同时,二十大报告也对深化对国际形势和时代特征的认识与把握提出了新的要求,预留了理论发展和理论创新的空间。我们需要继续深化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研究,深化对和平与发展面临的严峻挑战的研究,深化对国际格局和世界形势发展走向的研究,进一步回答“世界怎么了”“人类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

二、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与建设:引领国际角色的变革

党的二十大报告在总结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时指出,“我们展现负责任大国

担当,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全面开展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国际合作,赢得广泛国际赞誉,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根本性变化,体现在我们对世界事务和全球治理的认知与实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关于全球治理体系的问题,十八大报告指出,“中国坚持权利和义务相平衡,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支持联合国发挥积极作用,支持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反对一切形式的单边主义,反对搞针对特定国家的阵营化和排他性小圈子。推动世界贸易组织、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机制更好发挥作用,扩大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等合作机制影响力,增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中国坚持积极参与全球安全规则制定,加强国际安全合作,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为维护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

十年的发展变革,从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到二十大系统提出了全球治理体系建设的价值导向、秩序准则、实现机制,我们对全球治理、全球治理体系的认识不断深化。随着综合国力的巨大提升,我们具备了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的强大物质基础;随着外交能力、参与世界事务的能力不断提升,我们的全球治理能力不断跃升,从主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到开始在全球经济、安全、生态、文明治理领域发挥引领作用;从接受全球经济治理领域的规则,到在全球经济、安全、生态、文明治理领域提出倡议、引领规则制定和践行、维护规则。中国从全球治理的接受者、参与者向建设者、领导者转变。中国从过去被发达国家视为全球治理体系的边缘、全球治理规则的被动接受者、被动改变者向新的全球治

理体系的构建者和新的全球治理规则的制定者、维护者转变。中国将“始终做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始终做国际秩序的维护者”。[①]

二十大报告在部署未来五年的任务目标时指出,“国际地位和影响进一步提高,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我们需要进一步深化对中国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研究,深化对提升全球治理能力和国际秩序构建能力的研究,细化全球治理具体领域全球问题及其解决之道的研究,进一步回答好如何进行全球治理,怎样引领全球治理的问题。

三、历史自信与文化自信:引领世界观念的重塑

二十大报告在总结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时指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文化自信明显增强、精神面貌更加奋发昂扬。”“中国人民的前进动力更加强大、奋斗精神更加昂扬、必胜信念更加坚定,焕发出更为强烈的历史自觉和主动精神,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的觉醒,是十年伟大变革在中国人民精神风貌和观念领域最为重要的变革,在对外关系领域,体现为中国人世界观念的觉醒与重塑。

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使得西方的知识体系、观念结构和价值导向也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地位,甚至被西方称为“历史的终结”。向西方学习总体上一直在中国的观念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并成为价值导向。在文化上则体现为总体上对西方文化的崇敬和对传统文化的否定或者是贬低。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被割裂。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重回世界体系”“中国全面向西方学习”等话语一度盛行,尽管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这样的认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自然而然形成的,但这种认识实际上是把中国的发展放在西方现代化的逻辑中予以认识和阐述。[②]

十年的发展变革,亲历国家的发展强盛,逐步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走出一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外文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477 页。

② 张骥:《深化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的着力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2 年第 7 期,第 41 页。

条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中国人开始重新审视自身的当代实践和文化传统，开启了文化自信与历史自信重塑的进程。文化自信与历史自信的觉醒与重塑，使得中国人能够重新审视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之间的关系，重新认识中华文明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当代实践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文化自信与历史自信的觉醒与重塑，也使得中国人能够以自身的实践经验和价值取向去观察、认知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敢于在否定主导性秩序缺陷和错误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国际秩序构想，重新认识中华文明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对良好世界秩序构建的价值和意义。

二十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自信自立”，“必须坚持胸怀天下”。展望未来，我们还要继续深化对中国人民精神风貌和世界观念的研究，深化对中国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国际观和国民心态的研究，深化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和阐释，进一步回答好如何认识中国与世界关系，如何认识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关系的问题。

全球安全赤字及其破解的时代探索

韩爱勇[①]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命题。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人类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破解日益严重的全球安全赤字，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已成为当前时代的一个重大命题，亟需国际社会做出更多更积极的时代探索。

一、日趋加重的全球安全赤字及其成因

安全是人类最朴实甚至是最原初的诉求，但这一基本诉求近年来似乎变得越来越奢侈，一个关键原因就是全球安全赤字加重，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全球风险社会的生成。全球化的内在驱动力在于生产力的迅猛发展，

① 韩爱勇，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

以至于要突破传统国家边界的限定以寻求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由此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世界各地人们生活的关联度前所未有地加强,各国之间不仅拥有了共同利益,而且也面临着共同威胁。换言之,全球化不仅表现为生产要素的跨国界流动,也表现为安全风险的跨国界扩散。与此同时,社会信息化的发展,不仅催生了信息安全、网络安全、数据安全等新型安全,也加快了风险流动的速度。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边界不再是国家安全的边界。任何一个国家的安全短板都会导致外部风险大量涌入,形成安全风险洼地;任何一个国家的安全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又会外溢成为区域性甚至全球性安全问题。[①] 全球风险社会由此生成,在当前突出地表现为,非传统安全威胁日益严重,不仅持续时间和影响时间长,而且影响领域不断泛化。比如,严重冲击世界供应链的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其影响到今天都还在延续。一些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为规避"长供应链"所带来的风险,而采取供应链"本地化"和"短链化"策略,不仅在重塑世界经济的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而且也成为影响大国关系稳定的重要因素。造成全球六亿多人感染的新冠疫情,时至今日依然在世界各地肆虐,严重冲击世界各国的公共卫生体系,带来严峻的公共安全问题,同时也加快了各国重塑供应链的进程,进而又为世界经济复苏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从今年3月份开始的北半球严重干旱,成为气候变化带来严重安全问题的又一个缩影。包括北美洲、欧洲、地中海地区、非洲东北部以及中国南方地区在内的广大北半球地区都出现破纪录的极端酷热天气,许多地区经历了极端干旱。极端干旱又催生了粮食安全、能源安全和北极地区因为解冻而有可能释放出新病毒从而导致生物安全等安全问题。综上可见,全球风险社会一定程度上已成为当前国际社会所面临的日益严重的非传统安全赤字的代名词。

二是国家面对的不再是单一的安全风险,而是各种风险传导叠加升级形成的安全风险综合体。联动性是当前安全问题的一个突出特点。客观地看,今天已不存在单一甚至是单纯的安全问题,而是安全同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问题

① 《习近平在国际刑警组织第八十六届全体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全文)》,http://www.gov.cn/xinwen/2017-09/27/content_5227786.htm。

密切相关,非传统安全因素与传统安全因素相互影响。正如我们所熟知的,国家没有发展,安全必然出问题,就是国家安全和发展融为一体的表现。如此一来,各领域的安全风险因素也就随之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甚至相互激荡,如果防范不及、管控失当就演变成各类风险因素交织在一起的安全风险综合体。安全风险综合体所具有的国外风险向国内流动的倒灌效应、不同安全风险交织的叠加效应、不同国家地区安全风险相互联系所产生的联动效应,以及信息网络带来的安全风险的放大效应,表明在安全风险综合体内,安全威胁不再是单一的,安全问题的边界不再是清晰的,安全风险的影响不再是完全可控的而呈现出更多更大的变数。进而言之,在面对安全风险综合体时,我们只是知道正面临着安全威胁,但不知道这种威胁到底是什么以及它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安全威胁也由此蜕变为对未知的恐惧。国家不同程度地或多或少地处于所谓的“恐惧”中,也成为今天安全赤字日趋严重的一个表征。

三是安全困境的结构化。安全困境是指这样的一种情景:在无政府状态下,一个国家扩充武备保障自己安全的努力,会让另外一个国家感到威胁,反之亦然。可以看出,安全困境的生成与体系结构无关,它产生的前提是国家在主观上无伤害意图,客观上也无伤害行为,但结果却让另一个国家产生了完全相反的认知。由此可以推断,如果国家彼此充分了解对方的意图,则安全困境也就不复存在。但现在大国之间的安全困境却镶嵌在体系结构的变化过程中,呈现出安全困境结构化的态势。也就是说,大国清楚彼此的意图,但却依然将对方发展实力的行为视为威胁,其根源在于大国间实力和影响力的消长所带来的结构性矛盾,最为典型的就是中美之间的战略互动。长期以来,美国在周边地区拥有着显赫的影响力优势,随着中国地区影响力的扩大和美国影响力优势的快速褪去,中美在周边地区形成了一对结构性矛盾。尽管中国一再向国际社会声明,中国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和热点问题的斡旋者。[①]

① 《2022 年 10 月 13 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 https://www.mfa.gov.cn/web/fyrbt_673021/202210/t20221013_10782902.shtml。

但美国仍然将中国视为“最严重的地缘政治挑战”,认为“中国也是唯一一个既有意愿也有能力重塑国际秩序的竞争者……美国与中国的战略竞争是全领域的竞争。”[①]中美之间的安全困境显然已经结构化了。当前世界大变局最显著的变化就是新兴国家崛起和国际影响力的扩展,以及西方国家影响力的相对下降。如果我们将中美之间的战略互动推而广之就可以发现,结构性矛盾正在守成的西方大国和新兴大国之间生成,尽管彼此意图是清晰的,但双方的结构性安全困境依然出现,并表现出两大特征:一是大国地缘政治竞争日趋激烈;二是西方大国泛安全化的倾向日益明显,持强凌弱、巧取豪夺、零和博弈等霸权霸道霸凌行径大行其道。也就是说,大国之间的安全赤字因为安全困境的结构化已呈现出日趋加重的态势。

全球安全赤字日益加重有多重的原因。首先,全球经济发展乏力。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产业链和供应链加速调整,但到今天整个世界仍尚未形成带动大规模就业和产生大规模财富的新业态和经济增长点。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发展迟缓不仅动摇安全的基础,也弱化国家解决安全问题的手段。而且对于大多数国家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发展就是最大的安全,也是解决地区安全问题的“总钥匙”。[②] 当然,发展乏力也冲击着应对安全威胁的国际安全合作的开展。因为发展迟缓意味着“做蛋糕”的难度加大,此时国家的政策重点由“做大蛋糕”转向“多分蛋糕”,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就是典型的表现,国家间的利益矛盾随之而来,此时也就难言安全合作的开展。其次,国家应对新型安全威胁的准备明显不足。比如,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成为关键的生产要素,它的产生先天地需要大规模且处于流动中的市场做支撑,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维护国家的数据安全是一项艰巨任务。再如,此次新冠疫情本质上也是生物安全的一种形态,德国病毒学家卡林·莫林认为:“病毒早已存在,我们是病毒世界的入侵者,而不是反之。”人类世界如何与病毒世界互动将会长期考验着我们的智慧。

---

①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pp. 23 ~ 25,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10/Biden-Harris-Administration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10.2022.pdf.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356 页。

凡此种种,在新型安全威胁面前,不仅应对手段和能力不足,更关键的是缺乏足够的研究做支撑,这也导致了新型安全问题一旦出现不仅在短时间内蔓延全球,而且存续时间、影响时间不断地被拉长。第三,应对安全威胁的国际合作与全球安全治理体系发展严重滞后。这表现在一些西方大国坚守霸权逻辑,奉行冷战思维,追求绝对安全,导致一些国家成为另一些国家安全的威胁,更遑论安全合作的达成;联合国效率低下、架构陈旧、改革迟缓,不仅应对传统安全乏力,还面临着沦为大国政治权杖之虞;全球安全治理体系发展迟缓,美国主导的同盟体系虽然存续时间最久,制度性最强,但并非为解决全球安全问题所设,而在于护持美国的全球霸权;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概而言之,安全问题的出现体现了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态势,而安全赤字的加重无疑表明,这种发展很可能是一种“不安全”的发展形态。这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探索破解安全赤字之道,将发展重置于“安全”的基础之上。

二、全球安全倡议:破解全球安全赤字的中国探索

破解全球安全赤字,中国一直在积极探索,其中尤以中国倡导的全球安全倡议令人期待。2022 年 4 月 21 日,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 2022 年年会开幕式上首次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落实。”全球安全倡议核心要义包括: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坚持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坚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坚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等。[①] 这六个坚持构成了一个涵盖安全理念、安全原则和解决安全问题路径的相对完整的思想体系,旨在回答“世界需要什么样的安全理念、各国怎样实现共同安

① 《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 2022 年年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全文)》, http://www.fmprc.gov.cn/web/zyxw/202204/t20220421_10671052.shtml。

全”的时代课题。[①]这也为国际社会破解安全赤字提供新的安全理念和实践路径。

一是为达成全球安全合作提供了新的安全理念。安全赤字的加剧很大程度上源于安全合作的缺失。传统大国安全理念的基本逻辑是“以权力寻求最的大安全”,在这种安全理念的框定下,安全合作的目的在于大国维持权力的优势地位而非实现普遍的安全。推进全球安全合作需要新的安全理念,这一理念既要以全球安全为归宿,又能照顾到各国合理的安全关切,特别是要摆脱以权力求安全的历史窠臼,这样实现世界普遍安全的国际集体行动才能有效推进。以“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为核心的新安全观,所要实现的目标是以合作的方式构建安全共同体,具体而言,各国在过程中追求合作安全,就结果而言旨在实现共同安全。这样新安全观视域下的安全就有了两个新内涵:一是安全是平等的,获得安全是国家平等权利的有机组成部分,跟国家权力的大小没有关系。二是安全是共同的,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实现脱离世界安全的自身安全,一国的安全依托是促进国际安全,而不是依靠单纯的实力建设。[②] 这就使全球安全合作建立在各国平等的安全权利基础之上,不再追求国家间权力的差距,做到合作以实现真正的安全为目的。

二是为解决全球安全问题确立了基本原则。解决安全问题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削减安全赤字的存量,更关键是有助于国家间战略互信的达成。为解决安全议题,全球安全倡议提出“坚持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的原则。以相互尊重作为解决争端分歧的原则和出发点,并非新观点,但在当前却有时代的含义:虽然世界进入全球风险社会,各国已是荣辱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但民族国家依然是基本单位,民族国家之间的合作依然是应对安全风险的有效方式。因此只有尊重各国核心的利益、平等的权利、文化的差异和发展的偏好,尊重各国作为民族国家的一切权利,国家间的安全矛盾与分歧才有可能得到彻底解决。而所有的尊重的一个必然推论就是,解决问题的方式要以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进行。这样一来,以尊重各国的权利为出发点、以对话协商来履行国家的权利作为过程、最后以和平方式来保障各

① 王毅:《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守护世界和平安宁》,《人民日报》2022 年 4 月 24 日,第 6 版。
② 韩爱勇:《全球安全倡议与构建周边安全新架构》,《国际问题研究》2022 年第 4 期,第 88 页。

国的权利,就构成了解决安全问题原则的三步曲。这对于解决国家间存在的任何安全问题都富有借鉴意义。

三是为构建全球安全治理体系指出了方向。何谓全球安全治理体系?简单来讲,就是各国遵守基本的国际原则,合作应对各个安全领域的风险挑战。在这一方面,全球安全倡议提出三个坚持:“坚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坚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颇有参考意义。国家作为安全治理体系的行为体,重视其合理的安全关切,既是尊重它作为体系成员的基本权利,也为激励其参与安全治理提供了动力。规则原则是任何体系得以存续并运转的基础,全球安全治理涉及到国际社会的每一个成员,当前能得到所有国际社会成员认可的就是“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这一原则本质上也是在保障所有成员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安全治理要指向具体的安全风险领域,倡议提出要坚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当前传统安全威胁依然存在,尤其是大国竞争呈现出日趋激烈的态势,但要看到,在今天的这个全球风险社会里,各国面对的是安全风险综合体,其中尤以非传统安全威胁突出,它的跨国性、流动性、诱导性和持续性,事实上使得这类安全风险成为各国最大的共同安全挑战。如果传统领域安全带来国家间的安全分歧,非传统领域安全则提供了国家间安全合作的契机。故此将这两个领域的安全统筹起来,不仅有助于解决安全赤字的问题,也为协调和促进国家间关系提供了平台。

全球安全赤字加剧折射出的并不是全球安全问题的失控,而是全球安全治理的滞后和大国国际责任的缺位。中国的探索可谓一涓清流,其势虽尚小,但却汇聚了各国追求普遍安全的共同愿望,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就是未来的世界潮流。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①]

刘宏松[②]

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指导,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既

① 本文系 2018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研究”(项目编号:18ZDA007)的阶段性成果。

② 刘宏松,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全球治理之维。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和平赤字、发展赤字、信任赤字、治理赤字急剧增加,安全、经济等议题领域的全球治理面临诸多挑战。

在传统安全议题领域,大国竞争、恐怖主义、地缘政治危机频发,既有国际安全机制在应对新旧安全威胁方面表现乏力。在网络安全、太空安全等新兴安全议题领域,各国难以形成一致认可的行为规则,安全治理陷入失序状态。在经济议题领域,贸易保护主义势力上升,逆全球化甚嚣尘上,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又对全球价值链和供应链造成严重冲击;作为一种生产要素的数据正迅速融入国际经济活动和经济全球化进程之中,但与之相关的治理机制却显著滞后甚至缺位。

尽管近年来全球治理改革已在一些领域启动,但不同的改革方案相互竞争,各国难以达成共识。在金融议题领域,各方在建立全球金融安全网、增强国际金融机构监管功能等问题上存在较大分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苛刻贷款条件引起了诸多争议。支持者认为条件性是确保借款国建立市场经济体系的有效手段,反对者则认为贷款条件超出了借款国的承受能力。在贸易和投资领域,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围绕争端解决机制、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和差别待遇、知识产权保护、透明度、环境和劳工保护标准等议题争执不下;另一方面,发达国家极力推动高标准经贸规则,发展中国家则主张与自身能力相匹配的治理模式。在数字经济领域,各方就规则制定权和技术标准主导权展开了激烈竞争,全球数字经济治理机制建设陷入困境。

面对前所未有的全球性挑战,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 的方向发展。”[①]在防扩散治理方面,中国坚定维护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为核心

①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http:// politics. people. com. cn/n1/ 2022/1026/c1024-32551597. html。

的国际防扩散体系。在朝核问题上,中国主张通过磋商实现无核化,提出了“双暂停”和“双轨并进”的解决方案;在伊核问题上,中国坚定维护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主张与伊朗通过建设性对话,妥善解决保障监督问题。在地区冲突治理方面,中国坚持“不干涉他国内政”原则,采取预防冲突、控制风险、政治对话、冲突调解等问题解决路径,为地区和平稳定贡献力量。在印巴冲突问题上,中国呼吁双方秉持“上海精神”,遵循《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缓解地区紧张局势。基于上述全球安全治理实践,中国提出了全球安全倡议,倡导各国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为破解安全困境、消弭冲突根源提供了理念指引,为“世界需要什么样的安全理念、各国怎样实现共同安全”的时代课题提供了行动方案。

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中国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倡议,采取了一系列改革行动。在贸易议题领域,中国积极参与世界贸易组织(WTO)改革,提出了四个方面的重点行动领域:一是解决危及世贸组织生存的关键和紧迫性问题;二是增加世贸组织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相关性;三是提高世贸组织的运行效率;四是增强多边贸易体制的包容性。同时,中国借助二十国集团(G20)机制捍卫 WTO 的权威性。在 2020 年 G20 领导人第十五次峰会上,中国与其他 G20 成员达成了《G20 应对新冠肺炎、支持全球贸易投资集体行动》,形成了“关于 WTO 未来的利雅得倡议”。在投资议题领域,中国积极推动 WTO 多边框架下的国际投资规则建设,维护《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并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组建谈判集团,通过小型一揽子模式或部门和诸边协定路径推进多哈回合谈判进程。此外,中国采取切实举措加强 G20 框架下的投资机制建设,推动 G20 成员达成全球首个多边投资规则框架——《G20 全球投资指导原则》,为各国制定国际国内投资政策提供了参考。针对全球货币体系改革,中国一方面大力推进人民币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改革,通过增加人民币汇率机制透明度提升应对资本流动的能力,另一方面积极推动人民币成为国际结算货币、国际投资货币和国际储备货币。针对国际金融机构改革,中国主张应减少国际金融机构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设置的苛刻贷款条件,持续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和投

票权改革,以使其份额和投票权分配充分反映各国在全球经济中重要性的变化。在数字经济议题领域,中国在2016年G20杭州峰会上推动G20成员达成了《G20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并在2020年G20利雅得峰会上明确表示,将为数字经济营造有利的发展环境,并将加强数据安全合作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为各国科技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环境。

与此同时,中国将"一带一路"作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平台,主动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相对接,以中国特色开发性金融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提供了实实在在的资金支持。从亚欧大陆到非洲、美洲、大洋洲,共建"一带一路"为世界经济增长开辟了新空间,为国际贸易和投资搭建了新平台,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拓展了新实践,为增进各国民生福祉作出了新贡献,成为共同的机遇之路、繁荣之路。[①]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实践基础上,中国又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强调发展优先、以人民为中心、普惠包容、创新驱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行动导向,为破解全球发展难题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全球发展倡议与全球安全倡议一道,为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提供了新思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实践路径。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将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在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叠加之际,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高度契合国际社会现实需求,各国合力落实两大倡议将为全球治理体系产生持续、有力的改进效应。

中国倡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价值观,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自2017年以来,人类命运共同体被写入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社会层面决议"、联合国安理会关于阿富汗问题的第2344号决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关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和"粮食权"两份决议、联合国大会"防止外空军备竞赛进一步切实措施"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490页。

和“不首先在外空放置武器”两份安全决议等多份联合国决议中。中国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指导,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也取得了良好的实践成效。中国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涉及的各个细分领域制定出的“海洋命运共同体”“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等行动路线,已转化为海上互联互通、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建设以及世界各国合作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务实合作实践。中国在 WTO 改革议题上的积极作为,有力维护了 WTO 在全球贸易治理中的主渠道地位。共建“一带一路”已成为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在“健康丝绸之路”框架下,中国向中东、非洲、东南亚、欧洲等地区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派遣专家团,并提供抗疫物资。连接“一带一路”沿线数十个城市的中欧铁路网成为疫情期间医疗物资运输的重要通道。在数字经济领域,中国以《“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倡议》为基础大力推进“数字丝绸之路”建设,不仅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建设国际海缆、跨境光缆系统、移动互联网及物联网,帮助其提升信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还通过金砖国家合作机制、G20、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积极推广数字经济治理经验,深度参与国际数字经济规则制定,在跨境数据流动的全球治理机制建设、多边数字贸易规则制定等领域为全球数字经济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

尽管如此,中国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中,也面临外部势力猜疑、地缘政治纷争等挑战。然而,这些挑战并不能改变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经验不断丰富、在全球治理中塑造力和影响力不断提升、“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的实践成效不断彰显的势头。“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取决于各国人民的抉择。”[①]在此关键时刻,中国将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同世界各国一道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进一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加强对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的阐释、倡导和实施以及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力度,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①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22/1026/c1024-32551597.html。